

水平,并通过有创意的会议主题,推动韩国乃至国际范围内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在这一背景下,韩国中国古中世史学会自 2006 年开始定期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此前召开的四次会议“透过简牍资料看中国古代史”(庆北大学 2006 年)、“公元前 1 世纪 ~ 公元 10 世纪东北亚国家结构和国际秩序”(首尔大学 2007 年)、“古代中国公私文书的流通与帝国秩序”(忠北大学 2008 年)、“古中世东北亚的疆界和领土问题”(2009,首尔大学),为韩国学者提供了与中国、日本等学者直接交流的平台,并成为向外国学者介绍韩国中国古代史研究状况的重要窗口,均收到了良好效果,因而此次会议亦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杨振红、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院 金庆浩)

2008 年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日)小尾孝夫 撰(东北大学文学研究科 日本仙台)

杨振红 编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以石刻史料为中心的研究引人注目,长期以来各方面都在召开各自的研究会,一直没有得到超越各研究会的壁垒相互进行交流的机会。在此背景下,2008 年 7 月各研究会共同主办召开的“中国石刻共同研究会”(于明治大学)值得一书。根据各报告,我们可以确认这一领域的研究在不断取得切实的成果。说到近年日益活跃的国际交流方面,2007 年以日中年轻研究者为中心创办的“中国中古青年学者联谊会”2008 年 8 月高兴地迎来了第二次会议(于北京大学)。给人留下国际交流确实是由年轻人开始并持续下去的印象。今年笔者收集到的本领域的研究成果共 120 篇,这里只介绍其中的 70 篇,下面分门别类进行介绍。

总论。首先想介绍的宏观性论作是谷川道雄的《内藤湖南的历史方法》(河合文化教育研究《研究论集》5)。本辑是内藤湖南研究特辑。该文认为内藤湖南的历史研究采用的是从文化发展史角度加以捕捉的历史方法,是从整体的视角和人类的能动性为前提思考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对研究者的视野不能超越具体对象的现状鸣响了警钟,主张中国史研究者应具有“自觉”。此文迫使我们进行反省。是否要回到内藤湖南另当别论,就我们自己而言,我们必须依靠各自的“自觉”常常思考从宏观的视野确立自己的研究意义。

政治史。近年出现了对正史等史料进行重新认识,将以往的政治史以及贵族制理解相对化的倾向,2008 年也有很多此类研究。上谷浩一《董卓事迹考》(《东方学》116)认为董卓所实施的政策延续了东汉灵帝时期的改革,将其置于从灵帝向曹操发展的三国时代史中给予肯定。安部聪一郎《隐逸、逸民人士和魏晋期的国家》(《历史学研究》846)关注以往从与贵族制的关系角度来考察的隐逸、逸民人士,依靠史料论方法对隐逸进行再探讨,尝试重新认识贵族制。他

认为以范晔《后汉书》为基础建立的对东汉时期隐逸的理解,受到晋代以后的影响,对此,他首先以郭泰评价的变迁(同氏《〈后汉书·郭太列传〉的形成过程》,《金泽大学文学部论集》28)为主要根据进行了论述。然后从汉碑的分析入手,指出东汉时期的隐逸召集了“童蒙”等众多门生,期望能够推广教化,从东汉到西晋,隐逸以学术为媒介成为士人的核心发挥着作用,在体制方面,通过“尚贤礼”等,建立招揽士人的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当以这一体制与以隐逸为中心的士人间的关系为基轴重新认识贵族制。伊藤敏雄《安部报告批判》(《历史学研究》848)对该文进行了批评。对于把魏晋到隋唐看成是中国“中世”的思考立场来说,“封建制”问题是一个重要论点,辻正博《西晋诸王的封建和出镇》(笠谷和比古编《公家和武家Ⅳ》,思文阁出版),对西晋诸王的分封和出镇进行了重新探讨,认为它不是以往所认为的“封建制”的象征,而是根据皇亲体制为了保持和伸张皇帝权力而采取的政策。福原启郎《〈释时论〉的世界》(《京都外国语大学研究论丛》71),对魏晋南北朝史的认识很有意思。元兴年间,作为九品中正制度基干的清议,已经“虚誉”化,选举已明显为私人所垄断。在亲身体验这一选举腐败的“寒素”王沈所作《释时论》中,包含了对这一腐败和“虚誉”的双重愤懑,在清浊两者的斗争中,不久爆发了八王之乱,进而它也成为招致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在西晋以后清浊的争斗中,东晋南朝形成了门阀贵族体制,北朝出现了向贤才主义发展的科举制的创立,并各自趋于稳定。虽然在个别地方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但值得学习的是他将研究对象置于历史潮流中这一研究姿态。此外,他还发表了《贾谧的“二十四友”所属人士数据库》(同上70)。此外还有①森本淳《东汉末凉州的动向》(《中央大学亚洲史研究》32),②满田刚《关于刘表政权》(《创价大学人文论集》20),③好并隆司《曹魏王国的建立》(《广岛东洋史学报》13),④安藤信广《三国、六朝抗争史中的建康》(三国志学会编《狩野直禎先生伞寿纪念 三国志论集》,汲古书院),⑤园田俊介《北魏时代十六国诸君主的子孙及其影响》(《中央大学亚洲史研究》32)等。①是对东汉末凉州的分析。作者认为当时反叛军马腾、韩遂和中央方面的凉州势力设想建立“凉州政权”,但对这一说法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论证。②试图对以往一直偏向于否定评价的刘表及其政权做出积极评价。③对东汉末曹操在控制政权的过程中,汉臣作出了怎样的反映,以及如何使魏臣成为中心进行了考察。④通过对侯景之乱时建康城攻防史的分析,考察庾信的行动。⑤考察了北魏时代十六国诸君主子孙的安置情况。

政治制度。在探究历史特质时,探寻制度性变化并加以分析的研究方法是不可或缺的。三田辰彦曾提出,从东晋元帝的皇位继承者和琅邪王家继承者两方面派生出特殊的继承方式,即由琅邪王(弟统)来补充皇统(兄统),其新作《西晋后期的皇位继承问题》(《集刊东洋学》99)为了进一步明确这一东晋的特殊性,溯至西晋,探讨了西晋的皇位继承问题。在经历了惠帝时期的皇位继承直接给予“皇太某”称号后,到怀帝时期,开始将怀帝本统的豫章王立为太子,可以看出成为“子”的皇位继承者要经过和成为“父”的皇帝一样的过程。因此,到东晋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从“弟统”(本统)向“兄统”(大统)递进的皇位继承体制。内田昌功《东晋十六国的皇帝和天王》(北大《史朋》41)尝试将十六国各政权所使用的天王号的意义放在皇帝号两千年的历史中加以捕捉。在四、五世纪非汉族向中国大量流入所伴随的社会变化中,以往汉族世界秩序的统治者的称号皇帝号出现了局限性。在这种状况下,给予非汉族君主统治中国一定合理性的就是天王号,天王号在使用过程中其性质也在不断变化,逐渐弱化,最终当皇

帝号再度启用时,它已具备了天王号所具有的对汉族、非汉族均具有的统治合理性。前岛佳孝《西魏宇文泰的大行台》(《中央大学亚洲史研究》32)对以往研究以及相关史料进行了认真梳理、订正,提出西魏宇文泰的大行台未被明文赋予确切的职务,是以宇文泰的幕僚机构出现,与国制制定、行政决定有密切关系,是一篇浮雕式佳作。木村政博《关于孙吴的都督》(《三国志研究》3)对孙吴的都督进行了探讨。伊藤敏雄《日本的魏晋时期土地制度史研究百年》(大阪教大《历史研究》45)整理了近百年的土地制度史和赋税制度史。

社会、礼制。由社会问题引发的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近年来虽出现低迷,但并未完全丧失。而关于礼制问题,由于受到多种制约,探讨这一时期特质成为不可避免的重要课题。石井仁《富春孙氏考》(《驹泽史学》70),指出孙坚等出身的富春孙氏,是对吴郡、会稽周边地域具有影响力的豪族,对以往认为孙坚等出身卑贱的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应当说这篇文章对三国时代史的理解仿佛一石投湖。此外,同氏《粗中考》(《三国志论集》)指出,三国时期梅氏率“部曲万余家”所“屯”之粗中,很可能是流民、蛮夷等各种集团杂居的沔南的村坞,沔南出现的相应的制度,就是都督制的起源和本质。窪添庆文《北魏荥阳郑氏》(《御茶水史学》51),考察了从北魏到东西魏分裂时期的荥阳郑氏。当时,郑氏在乡里荥阳及东南的淮西、寿阳一带很有影响力,并希望能通过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与政权建立联系、发挥重要作用。与贵族制问题有密切关系的氏族研究最近出现停滞,期待今后能有新的进展。此外,北村一仁《南北朝时期“渊薮”的地域分布及其空间特征》(《东洋史苑》70、71)对南北朝时期反叛频繁的地域进行了考察,明确了“渊薮”的地域分布。指出这些地区都具有适合隐匿的环境,大多居于水陆交通要衢和与之相连接的交通道路附近,而且多位于行政区域交界处。虽然王朝的统治领域似乎是平面的,但也表现为点和线上,并希望研究中能重视这一点。

其次关于礼制关系。小林聪《晋南朝宫城的构造和政治空间》(同纪念会编《森田武教授退官纪念论文集 近世·近代日本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各科学现状》,新泉社,2007),是2007年发表的,该文重新复原了晋南朝时期建康的宫城构造,指出太极殿的内侧区域被称作内省(禁省),与尚书省等工作的地方相邻,政治上很重要。对于了解这一时期与皇帝权力的关系很有启发。户川贵行《刘宋孝武帝的礼制改革》(九大《东洋史论集》36),指出孝武帝对明堂建设等礼制改革,和他实施的王畿设置方针一样,是以标榜以建康为中心的天下观为目的。渡边信一郎《天下大同之乐》(同氏主持《北朝乐制史研究》平成16—19年度课题报告),是探讨隋朝乐制改革整体情况和本质的重要论文。此外,高桥康浩《关于韦昭的〈吴鼓吹曲〉》(《日本中国学会报》60),将韦昭《吴鼓吹曲》和缪袭《魏鼓吹曲》进行比较,推测孙吴由于不能构建正统理论,而不能以祥瑞为根据主张其正统性。此外,同氏还发表了《韦昭〈吴鼓吹曲〉译注》(《三国志研究》3)等。金子修一《以国家祭祀为中心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回顾和展望》(《中国—社会与文化》23),对有关国家祭祀的问题提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

都市空间、历史地理。近年考古学在洛阳的成果引起了广泛关注。佐川英治《汉魏洛阳城的城郭构造》(《冈山大学文学部项目研究报告》10),是一篇以考古学调查和成果为基础立论的扎实之作。角山典幸《北魏洛阳城研究的一视角》(《中央大学亚洲史研究》32),确认《洛阳伽蓝记》记载的洛阳大市东南的河阳县治就是河阴县治,指出北魏洛阳居民是由河阴县和洛阳县两县组成。宇都宫美生《隋唐洛阳城的河川、运河和水环境》(《中国水利史研究》

37),以考古学成果和实地调查为基础,对隋唐洛阳水系进行了研究。

东亚。2008年关于东亚世界,有唐代史研究会召开的夏期研讨会,以及堀敏一《东亚世界的历史》的出版。川本芳昭《魏晋南北朝的世界秩序和北朝隋唐的世界秩序》(《史渊》145)认为与夷狄五胡汇流的隋唐向中国正统王朝转变的过程,和接受魏晋南北朝的册封并在这一体系中成长出现的日本等东亚各国的经历有共通性。藤野月子《汉唐间和蕃公主的下嫁》(《史学杂志》117-7)分析了从西汉到元朝和蕃公主下嫁的事例,推测五胡十六国北朝隋唐时期频繁出现这一现象,是针对北方民族导致的“北方性”所采取的政策。很有启发意义。此外,河上麻由子《中国南朝对外关系中佛教的作用》(同上117-12)认为以南朝特别是梁和南海各国间形成的崇佛为钥匙可以触及当时国际关系的实质。王贞平(薄培林译)《三国~隋朝中日关系中的外交文书》(《亚洲文化交流研究》3),对三国至隋朝的日中间往来的国书进行了考察。

出土史料、石刻关系。这是近年来呈现勃勃生机的领域,进而也是因文物的发现而期待研究成果更上一层楼的领域。首先关于长沙吴简,阿部幸信《长沙走马楼吴简所见调纳入简初探》(《立正史学》103),认为孙吴的调尚未像魏西晋那样成为定制,而是汉代调的延续,它不是以征收为目的,而是起着将征发的物资在县一级向民间回流时所产生的不平衡现象进行调整的功能。关于孙吴的户调制问题,通过对吴简所见“调纳入简”的认真分析,明确了目前的研究状况以及今后的课题,应当说是这一领域有益的成果。期待今后的进展。谷口建速《长沙走马楼吴简所见“限米”》(《三国志研究》3)对吴简中所见“限米”进行了探讨。关尾史郎《魏晋“名刺简”笔记》(《新潟史学》60)为了探讨长沙吴简中名刺简的意义,对魏晋时期的其他名刺简也进行了分析。此外,他近年来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方面也花费了大量精力,2008年共发表了四篇论文:①《随葬衣物疏和镇墓文》(《西北出土文献研究》6),②《高昌郡时代的上行文书及其行方》(《古代东亚的信息传递》),③《敦煌的古墓群和出土镇墓文(下)》(《资料学研究》5),④《吐鲁番新出“前秦建元廿(384)年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户籍”试论》(新潟大《人文科学研究》123)。①从以往“敦煌学”领域较少关注的吐鲁番文物的视角,对吐鲁番各地古墓群出土的随葬衣物疏和敦煌墓葬出土的同类文物进行比较研究。②确认了高昌郡时代的条呈文书及兵曹文书类上行文书与高昌国时代的上奏文书间的关联性。③接续上篇,对敦煌地区出土的镇墓文进行了探讨。④考察了新公布的吐鲁番户籍。这份户籍同时记录了各户占有土地和奴婢的数字,推测受到西晋时代的影响。岩本笃志《敦煌文献的形与色》(《资料学研究》5)从照相图版的独特价值角度,介绍了有用的三册图录本。附有精致图版的索引。此外,还有东贤司《与北魏墓志制作有关二人的人物形象》(《古代东亚的信息传递》)对北魏时期委托身边的擅长书法的人制作墓志铭的情况进行了推测;荻美津夫《北魏时代的音乐资料》(《环日本海研究年报》15)关注从古墓出土的陶俑和石窟内的浮雕等反映北魏时代的音乐资料;菊池大《神亭壶所附龟趺碑的再探讨》(《国学院大学大学院纪要》39)对神亭壶的龟趺碑进行了检讨。

其他方面 2008年从出土、石刻史料的分析角度,尝试对文献史料缺载的当时政治、社会等情况进行探讨的研究有很多。三崎良章《辽阳壁画墓所见辽东社会的一个侧面》(《早稻田大学本庄高等学院研究纪要》26)通过对辽阳壁画墓营造状况的探讨,探求没有受到汉魏交替影响的辽东的社会性。北村一仁《南北朝后期颍川地区的人们与社会》(《龙谷史坛》129),通

过对“敬史君禅静寺刹前铭”等四个碑文的详细分析,描摹出南北朝时期颍川地区的状态。此外,还有为探讨“郭休碑”所作的基础研究的津田资久《“郭休碑”初探》(《国土馆东洋史学》3)考察了魏收佛教观的山路隆浩《“彭城寺碑”所见魏收和佛教》(《龙谷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30)考察“寇臻墓志”的田雄信之《北魏寇臻墓志铭小考》(《学苑》807),探讨“袁月玑墓志”的会田大辅《北齐的萧庄政权人士》(公益信托松尾金藏纪念奖学金基金编《飞向明天》,风间书房)等。

美术。这一领域与上一领域有很多关联,金子典正《三国—西晋时代神亭壶所见佛像及其形成背景》(《佛教艺术》297),对神亭壶的佛像进行分析,并论及江南佛教的情况。小林仁《从中国北齐时代的俑看两大样式的形成及其意义》(同上)对北齐时代邺和晋阳的俑进行了比较考察。八木春生《关于西安北周石造如来立像的一考察》(《泉屋博古馆纪要》24)对西安的北周石造如来立像进行了研究。高林弘实、苏伯民《以彩色材料的材质分析为基础对敦煌莫高窟第二八五窟的复原考察》(《佛教艺术》298)是关于敦煌莫高窟第二八五窟壁画的彩色材料、技法等的调查报告。

思想。为了整体地把握史学,时常关心史学以外领域的研究成果是很必要的,但字数的限制也是实际问题。这里只介绍一部分与思想有关的成果。佐藤智水《河北省涿县的北魏造像和邑义(前编)》(《佛教史研究》43,2007),探讨了河北省涿县的邑义。他还撰有《关于中国初期的“邑义”(中)铭文编(一)》(《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46,2007)。仓本尚德《北朝时代方等忏和好相行》(《佛教文化研究论集》12)以新发现的《大方等陀罗尼经》十二梦王石刻图像为线索,考察了方等忏和好相行的密切关系,指出当时山西省东南部有重视方等忏的风气。同氏《南北朝时期〈大通方广经〉的成书和传播》(《中国哲学研究》23),指出《方广经》是在南朝梁时成书的,根据山西省西南部出土的有北周北定二年纪年的“陈海龙造像碑”的佛名,推测当时这一地区流传着《方广经》,以此为基础实行忏法,进而通过对敦煌文献的探讨,认为这一方法也是按照经典实施的。山口正晃《现在十方千五百佛名并杂佛同号》小考》(《敦煌写本研究年报》2),敦煌研究院所藏第六八号文献背面的内容是《现在十方千五百佛名并杂佛同号》,推测它很可能是在北朝末期成书的。渡边义浩发表了四篇论文:①《陈寿的〈三国志〉和蜀学》(《三国志论集》),②《“受禅表”碑中〈尚书〉的重视》(《三国志研究》3),③《王肃的祭天思想》(《中国文化》66),④《西晋“儒教国家”的形成》(《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47)。此外还有其他成果,这里只集中介绍与上述内容相关的论文。①陈寿采取《三国志》这一体裁,是在传递蜀学讖文的基础上,有主张东汉→季汉→曹魏这一正统继承的意图。②指出河南省现存的“受禅表”碑,并未依托汉代的讖纬思想,而是以《尚书》的论理性为基础将汉魏革命正当化,从中可以看到以否定讖纬思想的王素的“理”为基础向经典解释转向的时代风潮。③探讨了王素祭天思想的形成过程。④认为西晋是尊重经之“理”的“儒教国家”,泰始律令和各项政策是以儒教经义为经典根据的。

译注、索引。渡边信一郎《魏书·食货志》、《隋书·食货志》译注》(汲古书院)出版。最近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处于低迷状态,期待这一译注的出版能够促进这一领域研究的活跃。此外,东洋文库中国古代地域史研究班编《水经注疏译注(渭水篇上)》(东洋文库),对“渭水”篇的部分进行了翻译和注释。附有与《水经注》有关的解说文章,值得参考的地方有

很多。此外,还有冈田和一郎、笠松哲、目黑杏子《〈魏书·乐志〉译注》(《北朝乐制史研究》)。中村圭尔、室山留美子编《魏晋南北朝墓志人名地名索引》(伊藤敏雄主持平成20年科研费研究资料),将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的全部墓志和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丧年止于北周时期的墓志中的人名、地名编成索引。利用价值很高。关尾史郎、清水はるか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所收写经题记一览(Ⅰ)》(《资料学研究》5),将正在刊行的该书的第一册至第四册的写经题记做成一览表。

通过回顾,我们重新了解了对出土、石刻史料的研究确实有了提高。在将铭文等文字史料方面的成果作为学界共有财富的过程中,对其释文和书写顺序等进行相互对校、订正工作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论说类材料,虽然很遗憾没有记述下来历史史实,哪怕是魏晋南北朝史的常识,但这些史实仍散见其中。这应当就是论文公开发表前要对其进行深入考察的一个重要原因。必须用心才可以。在探索这一时代史的特质时,礼制关系的研究仍是关键,与此同时,与政治制度等相关的其他领域的研究,也不能仅仅探求事物变化的表象,而要明确其变化的内在要因,只有这样的工作才可能取得高水平的进展。本回顾没有涉及文学方面的研究,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只好委托专门的评述。

本文编译自日本《史学杂志》第118编第5号《2008年的日本史学界》

《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评介

林金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为吴仁安教授的新著,2009年1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78万字,分上、下两编。上编《明清时期的江南及其所属府州厅县著名家族概况》,共四章。第一章论述明清时期江南著姓望族的历史概况与兴衰的深层原因。第二、三、四章分别为《明清时期江东望族个案研究与典型家族史解读》、《明清时期浙江望族个案研究与典型家族史解读》和《明清时期以徽州府为代表的皖南望族个案研究与典

型家族史解读》。下编《明清时期江南著姓望族考录》,分甲、乙、丙三组。甲组《明清江东苏州、松江、常州、太仓直隶州、应天(江宁)、镇江等五府、直隶州著姓望族考录》,乙组《明清浙江著姓望族考录》,丙组《明清时期徽州府、宁国府、池州府等皖南著姓望族考录》。书末附主要参考书目近300种。本书在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有新突破,新材料,新观点,抓住要害,是一部社会史力作,也充分反映出目前我国著姓望族史研究的最新水平。